

黨的建設問題

馬林可夫等著

• 增訂本 •



華北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黨的建設問題·····	一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一三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二二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下培養幹部·····	三三
論忠誠與老實·····	四八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五八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	六八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七八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八八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九五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一〇六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一一五

黨的建設問題

聯共書記馬林可夫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底波蘭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所作

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第二部份

我黨最突出最重要的特點及其成功的基礎，就是它在我國人民大眾牢不可破的威信，和蘇聯人民對於我黨政策的竭誠擁護。黨的正確政策保證了蘇聯人民政治與精神之鞏固的統一，這就使我黨有可能組織愛國戰爭，擊敗敵人，並發動全民勝利地消滅戰爭的嚴重後果。蘇聯人民政治、精神的統一，深刻顯明的表現在黨與非黨聯盟在今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和去年各加盟共和國與各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選舉中的勝利，選舉是在高度的政治熱情中進行的，這就再一次的證明了蘇

維埃人民對於我黨的無限信任與擁護。

戰爭要求蘇聯人民艱苦與巨大的犧牲，當然，在戰爭時期滿足人民大眾迫切的物質與精神要求是很受限制的，所以在由戰時過渡到和平的時期，便需要採取若干措施，取消這些限制，保證滿足人民物質的與精神的需要，而且在戰時與戰後，蘇聯人民大眾的政治與文化水平在不斷的提高着，蘇聯人民希望滿足自己精神的與物質的需要。所有這一切，便對黨的領導與黨的組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隨着戰爭的結束與轉向和平，黨必須根據這些新的要求，認真的改造其組織工作，這種改造之所以必需，還因為在黨的組織工作中發現了戰時所沒有發展的巨大缺點，這首先就是黨的組織工作與思想教育工作的鬆懈。

我黨的成績及黨的與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在戰火中經過了考驗，這一點並不能使我們驕傲，不能使我們安於既有的成績，相反的戰後擺在我國面前的新的經濟與文化建設任務，與目前整個國際環境，迫切要求蘇聯共產黨（布）不斷的提高全黨的思想教育工作，鞏固黨的組織工作，是我黨頭等重要的任務之一。在戰

時，黨的機關會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組織後方，並將經濟轉入戰時軌道。在戰爭的條件下，黨的機關會不得不經常作些管理經濟的工作，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正確的，但是不能忽視這樣做的結果，便在黨的實際組織工作中產生了某些不良的現象，就是放鬆了黨務工作，而使黨代替了國家的經濟機關，這就是違背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基本領導原則之一。現在黨提出了鞏固地方黨的組織，加強黨內組織工作，作為黨的主要任務之一。提高黨務工作水平，提高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國家與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這就是現階段中我黨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要完成這些任務，就必須展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黨發展的基本條件，黨將繼續鞏固蘇維埃國家，將改善國家機構及政府工作，作為黨的基本任務。戰爭時期，政府機關在執行黨與政府的指令上，會作了最大的努力，這乃是黨在建立靈活準確的國家機構、培養忠實於黨的事業而又具有必要的知識與組織才能的政府工作幹部上長期工作的結果。

目前國家機關的首要工作，就是組織經濟與進行文化教育，堅決維護蘇維埃

法律，反對私有制殘餘，繼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提高一切工作領域內的國家紀律，在這種情況下，黨曾採取了許多措施，以繼續鞏固國家政權機關，加強其在解決經濟與文化建設任務中的組織作用，進一步鞏固蘇維埃政權機關與羣衆的聯系。相信我國最近即將舉行的地方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選舉，必將大大改善地方蘇維埃政權機關的工作。

戰後黨與政府工作的新任務，對黨的幹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也就迫切要求黨政幹部必須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與辦事能力，訓練與培養黨政工作幹部，以便幫助黨政機關內千百萬工作幹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以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以國家經濟的知識，與對蘇維埃國家經濟政策的了解去武裝他們；以對新國際形勢的知識，與對蘇維埃外交政策的了解去武裝他們。——這就是目前我黨所正努力實現的最大任務之一。

爲認真提高黨政工作人員的政治理論水平，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認爲必須在最近三四年之內，使各共和國、各邊疆區、各省、各城市、各區的黨政基本

幹部，在黨校或黨政工作人員訓練班內，學習一個時期，爲達到這一目的，黨會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改造黨校與黨的訓練班，建立了一座以三年爲一期的高級黨校，培養共和國的省的和邊疆區的黨政工作人員，目前在該校學習者約近千人。此外在該高級黨校下還附設各種以九個月爲一期的訓練班，以培養年青的省黨委與邊疆區黨委書記、省的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省的與邊疆區的報館編輯等等，目前在這些訓練班內受訓的學員有五百多名。

目前這種以三年爲一期的黨校與以九個月爲一期的訓練班，在各共和國、各邊疆區域及各省中心區域已有一百七十七座，在那裏受訓的黨政工作人員、少共團員和報館工作人員約三萬名，另設有直屬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的社會科學院，負責培養黨中央機關的、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各邊疆區黨委及各省黨委底理論工作幹部，高級學府的專科教授，科學研究機關及科學雜誌的理論工作者；社會科學研究院專培養具有下列專長的工作人員：政治經濟學、外國經濟學與政治學、國家論與法律學、國際法、蘇聯歷史、通史、國際關係、聯

共黨（布）史、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俄羅斯歷史與西歐哲學、倫理學與心理學、文學理論與藝術理論，學員在研究院學習期限規定為三年，目前在該校研究院學習的人約三百名左右。

在戰爭時期與戰後時期內，我黨獲得了巨大的增長，雖然黨在愛國戰爭的前線上曾遭受了很大的犧牲，但在戰爭期間，黨的隊伍不僅沒有縮小而且擴大了，如果黨在戰前擁有黨員與候補黨員三百八十萬的話，那變現在則劇增至六百三十萬了，黨員幾乎增加了一倍。這些新的共產黨員，都是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時期內加入聯共黨（布）的。黨員數量之如此劇增，這是我黨歷史以來不會有過的現象，新黨員中的絕大多數是當祖國正處在生死關頭的時候加入的，這就是說新加入我黨的絕大多數是人民中最堅定的份子。

由於黨在數量上的蓬勃增長及其成份的變動，更尖銳地提出了加強共產黨員政治教育的問題。大部份共產黨員、特別是在最近幾年內加入黨的人，都還沒有受過必要的政治訓練，聯共黨（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政治水平和黨員數量的增

長是極不相稱的，因此目前黨的努力的方向不是繼續擴大其隊伍，而是進行黨員與候補黨員的政治教育，以提高共產黨員的政治水平，因為質量總究是比數量重要。研究目前發行極廣的列寧傳與斯大林傳，對於提高共產黨員的政治、思想水平及對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事業是有重大意義的，在一九四六年我們已經恢復了被戰爭中斷了的出版列寧全集的工作，並開始出版斯大林全集，每種全集的出版五十萬冊，此外戰後還出版馬克思、列寧各種古典著作達九千萬冊，出版斯大林傳達一百萬冊，「聯共黨（布）史簡明教程」戰後增版一千萬冊，與初版合計，共出版三千多萬冊。

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與對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是分不開的，在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對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的教育，克服人民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是有決定意義的事。雖然在我國於粉碎和消滅剝削階級殘餘之後，國際資產階級已失掉了一切從蘇聯內部反對蘇維埃國家的支力點，然而他們還企圖利用蘇聯人民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個

人私有心理的殘餘、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個別份子對西歐資產階級文化的阿諛心理、民族主義的偏見等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培養與發展蘇聯愛國精神，如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的：『蘇聯愛國主義的力量，在於它不是以種族與民族的偏見，而是以無人民對於蘇維埃祖國的無限忠誠，與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兄弟般的友愛為基礎的。蘇聯的愛國主義，使各共和國人民的民族傳統與蘇聯一切勞動者的志本利益和諧的溶合在一起。』要發展蘇聯愛國主義，就必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黨教育蘇聯人民愛其他民族，承認各民族有獨立發展的权利。

近幾年來，黨曾不得不進行堅決的鬥爭，反對各種向西歐資產階級文化阿諛諂媚的現象，這些現象在我國某些知識份子階層中相當普遍的存在着，這也是可詭咒的過去沙皇俄羅斯的一種殘餘，黨不得不給那些阿諛諂媚的具體表現以堅決的打擊。因為在現階段上，這種表現嚴重的威脅着蘇維埃國家的利益，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國際反動派的代理人正企圖利用那些向資產階級文化阿諛諂媚的人，

以達到削弱蘇維埃國家的目的。十月革命將俄羅斯人民從外國資本的經濟與精神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將我國建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我國人民因實行了文化革命與建築了自己的蘇維埃國家，而打破了國家在物質上精神上依靠西歐資產階級的連環，使蘇聯變成了世界文化與進步的支柱。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容許對外國事務阿諛的現象存在呢？這種反愛國主義的行爲表現，及思想底根源，就是可詛咒的過去沙皇俄羅斯的殘餘，而這種殘餘，在我國某些知識份子思想意識中還佔居着壓倒的優勢。

在沙皇俄羅斯據有強固地位的外國資本家，曾千方百計地支持並向俄國移植這樣的觀念，即：俄羅斯民族的文化與思想是不值重視的，脫離人民並與人民背道而馳的沙皇俄羅斯統治階級不相信俄羅斯人民的創造力，不容許俄羅斯用自己的力量擺脫這種落後性，由此便產生了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即認為俄羅斯應該永遠做西歐「教師」的「學生」，這種陳腐的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現在正被美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利用着，企圖在蘇聯內部尋找共進行偵察活動與反蘇宣傳的強固

據點，這些外國偵探，極力想在我國某些不堅定的、並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對一切外國事物患間諜病的知識份子中間尋找薄弱的可以鑽空子的地方，於是這些人就很容易變成外國偵探機關的俘虜。

在目前情況下，黨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針就是不斷地克服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加強布爾什維克對一切思想蜕化之不調和態度，在這裏，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的決議（即中央關於『星』與『列寧格勒雜誌』的決議，及關於劇場上演節目的決議等等），和不久前根據中央委員會建議而舉行的哲學討論會，是有重大意義的。黨中央委員會底這些措施，目的在保證使戰鬥的蘇聯愛國主義精神在科學藝術工作者中佔居統治的地位，而加強蘇聯科學、文學、藝術底黨性，將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切手段（出版、宣傳、科學、文學、藝術）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於強調指出文學與藝術底巨大社會改造作用，及其對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特別是對青年進行正確教育，是『以勇敢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精心，不怕困難，準備克服一切障礙的精神教

「青年一代青年」的巨大作用後，又指出：蘇聯作家與藝術文化工作者，除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之外，沒有其它的利益，這就是爲什麼一切無思想原則、脫離政治、「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是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於蘇聯人民、蘇維埃國家利益有損，而不應在我國報章雜誌中有它們的地盤的道理。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指出文學與藝術應以黨的政策（它是蘇維埃國家生活的基礎）爲其創作工作指南。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底決議，警告了蘇聯文化的代表們，要它們莫向日趨衰退、瓦解的資產階級文學與藝術低頭，中央委員會特別強調全面開展原則性的客觀批評之意義，因爲沒有這種原則性的客觀的批評，蘇聯文學與蘇聯藝術便不可能繼續向前發展，爲了對各理論工作部門的缺點開展批評起見，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特出版了一個新的報紙——「文化與生活」，作爲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的機關報。在不久前，根據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建議而舉行的對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的哲學討論會總結中發現在我國理論戰

線上、特別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編輯工作中，存在着許多缺點，爲了克服這些缺點，爲了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領域中的科學理論工作之繼續發展，出版了一種新的「哲學問題」雜誌。

目前中央委員會正在製定聯共黨（布）的新黨綱，聯共黨（布）的現行黨綱顯然已經過時了，應當予以改變，除製定新黨綱外，中央委員會對黨章亦正在進行修改，因爲最近幾年來，國內情況與黨的情況已起了巨大的變化，黨章的許多條文已經不適用了。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藍列波巨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

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小——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使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

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夠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

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會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零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作品中更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

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達煤礦」托拉斯和「卡塞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斯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第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

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不允許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上腐爛發黴，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爲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科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

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人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份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

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從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犯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以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亞天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地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五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備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

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昏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醒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害瘡，但如果這個瘡開始腐爛時，就可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逃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就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人或事物，而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什維

克的領導人不能修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盡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困難悲嘆，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不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爲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發我們的瘡疾，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從家庭親友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的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爲這種嚴肅精

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爲對付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從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長時期中，都認爲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作得挺好，它底領導能受到無限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延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能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擊」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

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的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到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這樣還不夠，斯大林曾指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負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大會研究事物的本質，沒有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

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份子，而領導上的任務，恰在團結積極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為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含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為教育的方法，因為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上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為不正，欺瞞上級，而省

委不去揭發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護他們的缺點，姑息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息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要是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
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
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功之後，就仰首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
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
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染官僚習氣的領導人才有可能
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動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

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互相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搞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批評他，不願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為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多好呢？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麼？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麼？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私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吉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檢查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配貨物、私自供給、違反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場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吉爾吉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且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分了其他的物品。

由於這些緣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

了同自己的上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的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為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是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够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會受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蘇瑛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下培養幹部

『黨的生活』社論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鬥爭裏，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地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地揭發、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地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

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嗎？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地更嚴肅地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地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地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地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裏，由於廣泛地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連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羣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錯誤的

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場所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地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地掃除缺點；有真正布爾什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鬥爭中，來用布爾什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爲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

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缺點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蓋子來把它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要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慫恿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為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因為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爲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為批評與

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才能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念念不忘個人的自尊心而把個人利害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因為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為：『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為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

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作為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作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給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公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就要企圖以最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見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譁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把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今後應採取的改正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正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痹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潛藏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的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

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羣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在着大批的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羣衆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專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能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羣衆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份子會議，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場所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

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克服缺點，而是報告他們所做的工作，引證出很多統計材料。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將就個別人的自尊心，是否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為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要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定出改正的方法，這就要求較高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吞吞吐吐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

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都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着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爲它是不重要的，要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爲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領導者自己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

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使我們不能夠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聲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爲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的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

布爾什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煞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地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作爲它行動的方針，它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和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文化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犯了錯誤，就是一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不可抹煞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樣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

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地檢查時，而來全盤地吹噓恭維，或是全盤地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阻礙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個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地提高領導集體農莊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由於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上了第一次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讚頌，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夫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

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客已爲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高，那麼，就要更高地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忽視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地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掘發我們可能性和準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界線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

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地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葉羣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黨的生活」二十三期）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什維克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什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計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態。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

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爲來評判人。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爲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实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饒舌者或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上，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利益出發。

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創造性的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

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而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地提出不合真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及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們揭發出來。

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他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的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的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儘力超過完成國家所交的任务，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够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完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什維克不能也不應

該將牠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牠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可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鐵櫃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發給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完成國家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可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胆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性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育說：

『布爾什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地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爲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信譽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些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菲布爾什維

克的風習。誰接受了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方法，誰就造成一個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他的，却是盡力和平共處而不互相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地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特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訴苦。』

雖然這一切對於安得列夫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

時地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做了有利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地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人的。……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爲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实實地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着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要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

罵你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沒有執行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地提出方法糾正牠。對執行沒有完善而有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什維克對所負任務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地完成前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什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做

效之心的人。

（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葛萊普渥夫

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羣衆的連系，總關心這種連系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連系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裏。斯大林同志說：「布爾什維克的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連系。而只要是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連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什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羣衆，善於團結羣

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戰爭的日子裏，「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的連系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在人民羣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為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什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爲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曾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曾號召蘇維埃農民爲最快的提高農業，爲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鬥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爲高額收穫的羣衆進軍。

激發羣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

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說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羣衆，同人民的經常的連系，不僅善於教育羣衆，而且善於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爲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驗是不充分的。爲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羣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領會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的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已爲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爲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

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什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方法的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羣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要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

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羣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展羣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羣衆的幫助，連組織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什維克黨把自己對羣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什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羣衆的連系。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

自大，脫離羣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裏，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擔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份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象怎樣，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裏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也是最落後的。

布爾什維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羣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什維克同羣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地，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羣衆是有連系的，他常在

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一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什維克不需要這樣的「連系」。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羣衆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羣衆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連系，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羣衆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勵與宣傳，向羣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

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做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演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做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做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連系的形式。在這裏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心裏話，無懼地確定羣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羣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躲開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什

維克的實際。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羣衆組織的關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羣衆的連系，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黨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份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勞動者的一切羣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連系，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共產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羣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羣衆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夠每日每時地去同羣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爲成百萬羣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地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連系，善於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善於領導羣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什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羣衆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

——多爾庫諾夫

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爲更加光明的將來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國勞動者們，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及日益不斷增長着的政治的和生產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斯塔哈諾夫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中，在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無數革新者底生產業績中，在蘇聯學者、文藝工作者底成就裏，都得到自己的表現。蘇聯人民的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廣泛地展開了，因爲蘇維埃制度給我國人民底發展及創造勇氣以無限的可能。

我們的黨，是革新者底黨，革命者底黨，這個黨敢於推翻陳舊的標準，而接

受新鮮和前進的事物。

顯然，一種新鮮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並不是自流地、自發地，而是在緊張的、不斷的鬥爭中形成的，扶植一種新鮮的事物，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給與它以一切生長和形成的條件，這便是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底義務，尤其是每一個黨底領導人底義務。

斯大林同志把對新鮮事物的感覺，稱之為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底高貴品質。然而掌握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這首先就是說要善於看到未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依靠那種雖然幼小，但却在上升着的事物，這就是說，不要滿足於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不斷地向前進步。

有許多黨的領導人總是抱怨說：日常工作佔去了他們的全部時間，這就使他們沒有可能深思熟慮地去考慮本區、本省的發展前途問題。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種現象發生在這樣一些人們的身上，他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親手去做。他們不善於配合那些在他們負責領導下的各個不同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黨的工作人

員，不應該包辦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他底責任在於把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等各機關的一切力量推動起來，給以需要的方向，並督促他們能在實踐中堅決的執行決定。只有這樣，一個黨的領導人才能從瑣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決定本區或本省未來發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慮這些發展前程，去利用經濟上的可能性。

在這方面，一個區或一個省的計劃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要製訂計劃，不單是只照顧到今天的任務，而且要看到明天，這就是說，在每一區的經濟發展上要執行一定的政策。計劃就是這樣經濟政策的表現。那些全心全力去搞各區發展前途的黨的區委和省委，他們就是做得對了。

例如，去年聯共黨莫洛托夫省省委，召開了一個討論發展本省生產力問題的科學代表會議，全國著名的學者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莫洛托夫省有什麼天然寶藏可以開發？那些工廠必需首先建立起來？工程師和技術員應該按着什麼方面進行工作？諸如此類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該省的工作人員都得到了必要的答

獲。正因如此，黨的領導人才能够在自己底面前，提出具體的任務，推動黨的和財經的機關去解決最急迫的問題。

向前看，這就是說，對自己已經做過的東西給以估價，但並不是把它當做固定的總結，而是把它當做向前推進運動的出發點。有些領導人，當他們給某一運動做總結時，總是忘記事情底這一重要方面。他們常常只是把積極的和消極的現象加以羅列，痛罵缺點，提出許許多多的數目字。在這裏便忘記了關於新鮮事物底生動活潑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而發揚這種新鮮事物，澈底分析它的產生條件，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這就是為更形加速的、前進的運動向新的勝利之發展，建立了補充的源泉。

自然，當一個新的事物在它開始發生時，是不容易觀察出它的萌芽的。列寧在它的『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寫道：『當一個新鮮的事物剛剛出生時，舊的總是存留下來，在某些時間內，還比新生的強大，這在自然界中和社會生活中總是如此……我們急需仔細地研究新生底萌芽，極其關懷地去對待它，用一切方法幫

助它的生長，並「扶育」這些幼小的萌芽。」

爲了及時的發現新鮮的事物，爲其迅速的生長奠下基礎，就必須具有敏銳的感覺。有時，某一件事情，在我們按其長處給以估價之前，常是經過巨大的誕生的痛苦的。那些懼怕份外的操勞努力，慣於和和平平，按着舊秩序生活的人們，靠得住就是漠不關心新鮮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這樣的工作人員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是遲鈍的，他們是更多地傾向於陳舊的東西，他們早晚有變成墨守成規的人，保守主義的危險。

就拿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工作人員做例子吧。他們成年成歲地把許許多多的寶貴建議擱置起來，而這些建議如果實現的話，就能額外地給國家以幾千普得砂糖及節省千百萬盧布的開支，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把狹隘的本位利益置於全國利益之上，他們不但不支持這種寶貴的倡導，而且相反的去阻礙它們。甚至於在蘇聯輿論界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之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仍然繼續存在着對待新發明拖捱不用的現象。可以設想，在這些地方墨守成規及保守主義是多麼

根深蒂固。而這是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做領導工作的人員，脫離了實際生活，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工作經驗，與羣衆的連系，善於從國家的要求出發去對待每一件事情，這些東西便給一個工作人員以對新鮮事物的敏銳的感覺。幾年以前，庫爾斯克省的幾個集體農莊開始採用了勞動組織之小組制。當時省委領導人常常到各區裏去，仔細傾聽集體農民的意見和他們底提議，省委決定把這些零零碎碎的經驗普遍化起來，而且決定這個工作必須由省委來做，因爲省委和所有的區，所有的經濟的，蘇維埃的，黨的組織連系着，因爲正是省委手裏牽着主要的領導線索。

省委當時就盡心全力地研究了勞動組織的小組制。在集體農莊內給每一小組固定了經常由他們耕種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給各小組固定了由他們管理的作物：栽植作物，菜蔬，有時還規定了種植穀類作物。勞動償付中的平均主義被消滅了，收入按每一小組所獲得的收穫進行分配：獲得較高收成的集體農民小組，得到較高的報酬，而獲得較低收成的小組，則得到較低的報酬。

在研究勞動組織小組制的時候，集體農莊農民的經驗又被黨的領導人底政治經驗所支持並被導入了正確的道路。從一開頭，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用一切方法促成新鮮事物的產生，而且要幫助它形成、生產和鞏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寫信給集體農莊主席們、集體農莊黨的書記們、村鄉地方黨的組織、小隊長們，告訴他們如何正確的組織勞動，如何採取按件工資制，如何分配收入，並如何去廢除非個人負責制及平均主義。

很可惜，並不是到處都能很注意地傾聽羣衆的呼聲，並把羣衆的經驗普遍化起來。有時便只局限於去寫些鼓勵個別斯塔哈諾夫式工作者及個別單位的決定和指令，形式上給自己保了一險，以求避免受到工作不活躍的責備，但實際上對於採用和鞏固新生事物方面，並沒有做任何工作。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不能發揚主動性，而只會停滯它，絞殺它。

我們黨的組織，在深入的利用斯塔哈諾夫運動前進形式及新的工作人員方式等方面，已經積蓄了巨大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說，

必須每天都去幫助那些採用新的勞動方法的人們，給他們掃清被墨守成規、保守主義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幫助一二個斯塔哈諾夫式工作者還是不夠的，前進者底經驗必須爲全體工人所享有，只有這樣，這種經驗才能獲得全民的意義。雖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哈諾夫運動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普遍化，加以傳播，遠非所有的地方都做了應有的程度。一般來說，這些進步的經驗，很快就被頌揚一番，然而並不是都能找得到其中細膩的、科學技術的根據，而這種根據恰恰能够成爲生產中的工作方法和規則。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從黨的工作本身發生的，黨的工作就是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團結勞動者爲着新的勝利而進行鬥爭。黨的活動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滯的。創造的熱情在一個黨的工作人員來說，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計自己底經驗，經常地檢查自己底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和要求。一個具有對新鮮事物感覺之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漠視別人底經驗，並不以學習和掌握別人底經驗爲可恥。有些所謂「絕無錯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認爲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向別人學習，也沒

有誰值得他去學習，他們把自己底眼界只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之內，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底有限的學識的圈子裏，於是他們就老是僵在一個地方了。

當一個工作人員不斷地去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時候，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就日益鋒利和敏銳。馬列主義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胚胎中的新生事物之萌芽，並按其長處去估價它們。這種感覺是永遠生動活潑的，永遠發展着的馬列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在新鮮的和陳舊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發展的之間的鬥爭，就組成發展過程的內容。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個布爾什維克就能深刻地認識黨底要求，黨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要求，就是要求我們注視生活中出現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們不去依據那些陳舊、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發展着的事物，學習馬列主義的意義，對幹部的實際活動來說，是無法估價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用預見和辯認前進事物的能力，以及為其形成和生長創造一切條件之能力武裝着布爾什維克。

在我們的社會裏，正在進行着新鮮事物之誕生，及其與舊的事物鬥爭之不斷

的、羣衆性的過程。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摧毀衰老、落後事物的方法，就是爲培養新生、前進事物而鬥爭的方法。斯大林說：「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個真理是純潔的、明澈的，有如泉水那樣純潔、明澈。」展開對落後的批評，責備墨守成規的份子，布爾什維克就是給新生事物及其鞏固肅清道路。

戰爭結束以後，在黨的面前，出現了新的任務。蘇聯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爲祖國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們每天都給自己勞動方法帶來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使我們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順利地向前進步。及時地發現這些新鮮的東西，維護它，使它能廣泛地傳播開來，任何時候也不滿足於自己的創造，鼓勵羣衆的創造熱情，這就是每一個黨的領導人、每一個布爾什維克之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

（洵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西 寧

——效率與遠見

布爾什維克的效率，乃是一個政治領導者的黨的工作人員所必要與應有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是不可想像的。

效率應理解為：在實際上能夠實施黨的決定，及時採取實現黨的路線的辦法。一個講究效率的組織者，應有在一定情況中指示方針的能力，應正確和不耽擱地解決問題，及時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執行國家的計劃、任務、指令。這是以工作人員的經驗、知識與政治敏感來達成的。

列寧曾經說過：黨的組織與黨的領導者的意義，在於「爲了迅速與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就要培養必需的知識，必需的經驗，以及除了知識和經驗以

外的必需的政治敏感」。不言而喻，有效率地、迅速地、不耽擱地解決問題，與急躁和草率沒有任何共同之點。這種急躁，常常引到放棄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的問題，代替以次要的、偶然發生的問題，而嚴肅的組織工作代替以空洞的例行公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幹部，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的時候，在全面地判定方向和全面地估計一切長短的時候，應當英明和不急躁」。

布爾什維克的效率就是才幹。斯大林同志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替清談家的工作者，替老實與忠誠地對待蘇維埃政權，但沒有能力領導，沒有能力組織什麼的人，畫了一個像。斯大林同志論這些清談家說：「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提出來了，他們有轉變，有進步，然而事情原封不動」。斯大林同志當時要求把那些可以讓任何活生生的事情沉溺在滔滔不絕的演說裏的不可救藥的清談家，從領導位置上撤職。斯大林同志說過：「在講效率的工作中，沒有清談家的位置」。

我們也有在講效率的工作中之另一種類型的不可靠領導者。這就是不敢解決

任何問題的領導者。他喜歡在與急驟作鬥爭的形式底下來作拖延事情，喜歡在集體領導的形式底下開會。爲了避免解決問題，他總是裝着『想一想』、『商量商量』的樣子，然而過後他自己既不想也不同別人商量。在州黨委的實際工作中有這樣的情形，爲了糾正已發現的缺點，要採取有效的辦法，但是把問題推給黨委會議，並且也沒有準備考慮問題。這種『領導』通常引起遲延、緩慢，有時還引起缺陷。

工作中的效率要求：確實的計劃，人力的正當分配，對執行情形的檢查，同被領導者的密切聯系。如果沒有製定能夠估計到主力軍與後備軍的適當計劃，沒有建立各種武器之間的互相配合，沒有規定精確的期限，沒有委任負責人，沒有對執行之周密與不斷的檢查，那麼有成就地進行軍事行動是不可設想的。同樣的，如果沒有計劃，沒有檢查，任何經濟活動和經濟工作中的成就，都是不可想像的。在戰爭中情況變化的場合，如果指揮上不見得靈活，對計劃不加以適當的修正，那麼部隊會遭受失敗。在經濟工作中的情形，也是這樣。這裏也要求同樣的

靈活性、創造性和真正的效率。

不言而喻，不僅在經濟領導的問題上，而且在黨內工作中，也要求效率。黨的機構的一切工作者，應賦有效率、敏捷、能動性。必須不拖延、不停滯地解決發生在黨委面前的問題。及時接受意見，迅速吸收共產黨員的創議，善於指導他們的活動，及時糾正工作人員的錯誤——這一切是政治領導者的必須的義務。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在聽取依瓦諾夫州黨委工作報告後，曾經通過了決定，建議在黨的州委、區委與市委、蘇維埃與經濟的機關的實際領導中，提倡講效率的工作方法。中央委員會把這個任務具體化了。什麼是講效率的方法？這就是：

及時解決問題。

不花費時間在不必要的會議上。

對通過了的決定之執行，施行嚴肅的組織工作。

分配負責執行具體的委託和任務的工作人員。

依靠真正了解確切情況者來研究問題。

及時揭露與糾正黨與蘇維埃組織中工作的缺點。

對黨與政府的決定與指令的執行，進行日常的檢查。

在進行農業運動時，對黨的工作者要求高度的效率。春季播種，照顧播種，穀物收割，穀物供應，秋季播種——這一切工作都帶有季節性質。在這裏如果缺乏效率、遲延，可以破壞全部事情。對黨的領導者，不僅要求為實行工作而定出好計劃，而且還要在情況中指示方針，在運動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作迅速的決定，熟悉當地特殊性，看到現存的困難，並採取辦法克服困難。

現在地方黨的領導者，正埋頭於完成春季的播種工作。這裏有許多迫切的、完全必須的、不可耽擱的大小事情。播種之最迅速的完成，依靠於效率、實際辦法之及時採用執行情形之日常與時刻檢查，對發現的缺點之立刻反應。這裏黨的工作者要是不惜時間和精力。

同時，正是現在而不是再晚些，應當最緊張地展開收割的準備工作。正如在

冬天，就應當關心春季播種——修理拖拉機、選擇幹部等等，與進行播種同時就應當準備收割——修理聯合收割機、農具、乾燥器、倉庫等等。

但是如果認爲領導農業可以僅限於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僅限於播種和收割，那就錯了。黨的工作者應當看得更遠，深刻地看透經濟的規律。要熟悉集體農場的經濟狀況。分析材料，不要限於平均數字，而要歸納其有機的組成部份。要會把今年的總結與去年的、許多年的總結來比較。這樣就可以看出發展的動力和趨勢，就可以看出長短。黨的領導者可以及時干預、糾正專情、防止落後。

對於有些黨的與經濟的工作者，我們說他們是講效率的人，是「消除缺陷的專家」。當然，排除缺陷是很大的藝術。可是做到沒有缺陷，及時預防缺陷，那是更大的藝術。

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不僅要求及時進備當前的運動，而且善於看得更遠。應記得斯大林同志的話：「掌舵時要看。如果什麼也看不見，等到情況使我們遭了

麼，那麼這並不是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有遠見。」

我們的幹部忙碌於完成城鄉經濟計劃的龐大的、當前的、有效率的工作。這一個工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只有脫離生活的人們才會蔑視它。然而同時如果完全埋頭於所謂「當前的工作」中，不理會作過的工作，不考慮工作的前途，那麼這是不可救藥的罪惡。生活不是按照一個標準前進的，日新月異，情況變化着，新的問題發生着，對新穎事物具有敏原的黨的工作者，應從此中作出適當的結論。

時常我們的工作人員陷於日常的當前的事務中，陷到這樣程度，就是自己失掉了思考前途的可能性，失掉了線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論建立蘇維埃領導機關的工作的一封信上曾寫道：必須「使自己擺脫雜亂無章，這種雜亂無章會葬送我們大家，要保證自己安靜地全面思考工作的可能性」。我們黨與經濟工作者要記住列寧的這些話，這多麼重要。

完全忙碌於當前工作的人，正是因為沒有從全面去思考工作，而意外地面臨

着嚴重的缺陷。這種工作者時常滿足於局部的成績，一天的成績，一個運動的成績，而無視於在整個方面正在醞釀的落後。

例如，烏克蘭一些州的一些黨的工作者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為運動而運動地、表面地、不分析經濟地、不注意經濟發展趨勢地領導農業。一般說來，農業運動進行得並不壞，彷彿是完成了計劃。然而在烏克蘭像春麥這樣重要的農作物的播種，一年一年減縮了。例如在波爾塔瓦州，春麥播種一九三七年為十三萬五千公頃，一九三八年為十萬八千五百公頃，一九三九年為九萬九千公頃，一九四〇年為九萬一千公頃。在戰後，一九四六年春麥播種大大落後於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波蘭塔瓦州黨的領導者沒有分析農業經濟，沒有及時發現減縮春麥播種的有害傾向。其他的烏克蘭的工作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斯大林同志，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二月擴大會議，已指出了這一點。

遠見的藝術，也是工業領域中黨的工作者的寶貴品質。一些工業中黨的與經濟的領導者不去看明天，不關心明天，滿足於已得的，因而失掉批判地估價經濟

成就的能力，雖然這些成就有時是不鞏固的。例如，有些煤礦工業的工作者的特點就是如此。大家知道，採煤的成就就是由於準備工作的及時進行來決定的。有時有這樣的情形，煤礦在幾個月期間，甚至一年之內，很好完成計劃，然後「意外地」破壞了計劃，而開採量的下降。檢查時發現了，當進行煤的開採時，經濟領導者與黨的組織不關心準備工作的進行，不看一看煤礦的明天。

這不僅指個別的煤礦，而且同樣指整個煤礦區。拿庫茲巴斯為例吧，這裏煤的開採曾經迅速增長，而在最近速度的增長猛降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庫茲巴斯是後起的區域，是在上面的礦層採煤的。爲了這個目的，規定了採礦的適當方法。然而情況變了。上面的礦層已不能供給我們所要求的煤的數量。需要轉向下面的、更深的礦層去。爲了這個目的，先前舊的採礦方法往往不能復用，需要以適合於煤礦的新條件的新方法來補充它。然而庫茲巴斯黨的組織與經濟領導者沒有預先考慮、研究和實驗這種方法。現在不得不匆匆忙忙進行這個工作。雖然現在地方組織有可能表現出應有的效率，但由於缺乏遠見而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

阿罕格爾州的木材工業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阿罕格爾州的黨委第一書記尼古拉也夫同志和州黨委，沒有注意本州主要的經濟部門木材工業的事務。他們很少到木材工業場和木材站去，同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什麼聯系，並且不清楚木材供給準備的真實情況。脫離了木材工業場的州黨委，沒有去解決阿罕格爾州木材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問題：提高機械化、培養固定的工人幹部、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沒有揭發木材工業部工作的嚴重缺點。

爲完成當前計劃的鬥爭，應與解決前途問題，與預防缺陷、不均、落後配合起來。如果黨的領導者不向前看，那麼領導的效率便失掉價值。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莫斯科書記 左爾寧

布爾塞維克黨化費了許多精力，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幹部。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深邃思想和無限忠誠，便是這些幹部最寶貴和決定的品質。受過布爾塞維克教育的蘇維埃經濟工作者，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築在全心全意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服務的基礎上。生產任務的先期完成，對於工廠經理、技師、車間主任、技工說來，乃是他們高度精神上的滿足。先進的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並不滿足於計劃之一般完成，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自己的實際經驗和集體的勞力，放在不僅完成而且超過國家的計劃，並減低生產費上。

經濟工作者之布爾塞維克黨性，就在於他絕不滿足於既得的成果，他經常在

自己面前發現尚未解決的任務，不固步自封，而是向前進展。這一特點是我們人民所固有的。

蘇維埃人對獲取新成就之難於抑止的意志，反映在社會主義競賽的結果中。這從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州的企業超過了五月計劃，其生產品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在六月十五日，差不多有五百個企業先期完成了六月份任務。莫斯科州的礦工在五個月內超過計劃而多產了數萬噸煤。州的集體農民們超過了穀物播種計劃，完成了馬鈴薯和菜蔬的種植。

蘇維埃經濟工作者的特點，在於他不圖「安閒的生活」，相反的，他樂於沸騰的活動。他的黨性在於他決不隨波逐流，而是頑強地逆着困難而前進，尋找和發現進步運動的道路。

克拉斯諾霍姆紡織複製工廠領導者，確屬於這一類人物。這一工廠的工人聲明希望和準備先期完成一年的計劃。但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實行許多嚴重的措施；嚴格提高生產修養，改善技術過程，建立和安置生產中的新的聯合染洗

機，設置準備產品時的機械化的轉遞，組織有傳送裝置的運輸。複製工廠和黨組織的領導者估計，這些措施的真正實現，不僅有了一般地超過計劃的可能，而且爲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創造了實際的條件。新機械的裝置和工廠的擴充開始之後，結果，他們能够每晝夜出產這樣多的紡織品，這個數量曾經籌劃只有到一九五零年才能完成。

蘇維埃的經濟領導者不把自己與企業的整體分開，由此來達到我們工業上的成就。他們與技師們、先進的工人們商量，盡量支持和鼓勵有創造性的人們，總結與運用斯達哈諾夫者的豐富經驗。

「巴黎公社」工廠的裁切工人馬特洛索夫同志，他使自己的工作合理化，並取得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大大超過了戰前的指數，但這一個人的成就沒有滿足他。他知道車間許多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不大。馬特洛索夫同志提議製訂一個廣泛採用保證使每個工人生產率增高的進步勞動方法的計劃。馬特洛索夫同志建議的價值和特點，在於他不僅是從個人利益（他的勞動生產率保證他高度的工資）出

發，而且願望取得這樣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落後的工人能夠趕上先進工人的水平。

「巴黎公社」工廠的經理立特曼同志和黨組織書記楚魯索瓦同志，用黨的精神對待瓦西里·馬特洛索夫的建議。他們支持了馬特洛索夫的倡議，幫助他研究其建議，吸收工廠的全體人員來重視這個事情，並且在實現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倡議下，使許多落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先進工人的水平上。「巴黎公社」工廠在黨的組織與刊物的幫助下，把馬特洛索夫的倡議當作我們全國的資產。

說到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上的黨性，我們所指的是工業上的領導幹部，不是一般地努力於超過計劃，而是爲此而採用了新技術與最完善的工藝學的方法。

黨的組織負有使命，以深刻了解擺在經濟工作者面前的任務的精神，來經常地教育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對待事情，對疲踢與保守的不可調和性，對爭取新而又新的技術高度的經常努力，產品出產的盡量增加，從蘇維埃工作者日常負責的國家工作中有機地流溢出來。

布爾塞維克——經濟領導者的出色品質之一，就是對自己企業中工人、技師、職員的需要之敏感的關切。在很好關懷具體需要的企業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工作上的成就。

然而，可惜，也還有這樣的領導者，他們脫離工人，不知道他們的需要，工人很難謁見這樣的領導者，並且從他那裏難以得到必要的幫助。而這種經濟工作者的工作，照例總是搞不好的。

戈爾素諾夫同志担任經理的墨基其工廠，經常的沒有完成生產計劃。這個工廠應當為莫斯科的地道電車製造車廂，但，雖然政府所規定的期限早就過去了，地道電車連一個車廂都沒有接到。

在這個工廠裏，沒有布爾塞維克的制度，而主要的是對人沒有黨的態度。冬天工人們不得不在冰冷的車間裏工作，而工人回到公共宿舍時，也沒有起碼的休息條件。在公共宿舍裏又冷，又擠，又髒，經濟和黨的領導者蔑視工人的需要，不關心他們。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黨委託他關心工人階級的需要時，應認爲是光榮的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應把技術、組織生產的問題與爲改善工人與職員的物質生活設施的日常鬥爭配合起來。

列寧——斯大林黨，以對國家的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來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者的幹部。

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把國家的利益提得高於一切。可惜，在經濟工作者中也有這樣的人員，他們力圖隱瞞企業的能力，把計劃定得輕鬆些，他們有時走上欺騙的道路，他們僅僅是爲了獲得獎金，而把未製成的產品寫到製成品中去等等。也有這樣的經濟工作者，他們不是節約地消費原料和資料，而是力圖預先領取超過真正需要範圍的原料和資料。他們爲了個人的安逸，在倉庫裏保存着各種巨額的物質貴重品，他們在裝備等等上對計劃機關作了誇大的聲明。這些自私自利的經濟工作者，沒有蘇維埃國家利益的黨的認識。他們像縮手縮足的小商人一樣，看不到離鼻子稍遠的事情，並且只爲狹隘的本位利益和自己個人利益而生活。雖

然這種人不多，但要堅決揭露、批評和以國家利益的精神來教育他們。只有在自己行動上由國家利益出發的領導者，才能稱職。

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不能把自己閉塞在僅僅是生產利益的圈子裏。如果他的政治眼光愈遠大，愈能更好地分析國內與國際事件，那麼他在解決生產問題上會更嚴肅，更覺悟，更深刻。工廠經理負有使命日常教育其下屬的幹部，發展他們愛國義務感。經濟工作者只有在自己是一個有足夠政治教育的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完成這樣的使命。經常從事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準，真正精通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布爾塞維克經濟工作者的必須的責任。經理，車間主任，不論大小的生產領導者的崗位——這同時也是黨的崗位。

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是蘇維埃領導者所必須有的品質。它應當經常伴隨着經濟工作者的活動，它應當成爲解決大小任務的鑰匙。只有在這樣條件下，在政治教育與馬列主義的鍛鍊的條件下，蘇維埃的經濟工作者才會站穩自己的崗位。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真理報）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消息報譯出的。我們黨的、軍隊的、民主政府的和人民團體的一切能讀的幹部，都應好好研究這篇文章，並且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列寧式的工作標準來檢查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知道毛主席和我們的黨中央是經常要求我們按照這種列寧式的工作標準來進行工作的，而毛主席自己的工作作風正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最好模範。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必須對成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負責了。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羣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存亡的。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

不斷的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繼續整黨、整政、整軍和三查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現在發表和學習這樣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適合時宜的。當然，這篇文章裏所說的某些具體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農村中是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是需要降低標準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不把這些作爲藉口，來原諒我們工作中的那些並非由此產生和並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現象。農村中散漫而停滯的小生產制度乃是官僚主義蔓延的重要基礎和掩護物，這正是我們在農村環境中工作的同志們所應當警惕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地與經常地來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毛主席說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和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和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就正是指出了這種必要性。至於在我們同志進入城市以後，如果仍然保守着那些本來就必須堅決反對的農村式的官僚主義習慣，就更是不可容許的了。

蘇維埃制度保證我國全體勞動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列寧把這

看作是我們國家機關底力量所在，認爲這使我們國家機關底活動有不斷改進可能。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蘇維埃機關，是爲人民底利益服務的，爲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服務的。

列寧從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視改進蘇維埃政權機關底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廣泛的勞動者階層自覺地參加蘇維埃機關底工作。

列寧非常重視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給斯大林的短札中，講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底改組，把下列幾項工作提到第一位，作爲改組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底迫切任務，這幾項工作就是：四出調查民間的疾苦，與拖延現象作鬥爭，用革命手段與各種濫職作鬥爭。

列寧要求我們毅然決然地、迅速地、絲毫不苟地執行蘇維埃政府底法令和指示。

列寧警告說：「最小的非法行爲，對蘇維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壞，已經是一個

空隙，而爲勞動者底敵人所馬上利用……』。

列寧在力求人們遵守革命法律時，嚴厲地同賄賂行爲作鬥爭，他把這種行爲叫作沙皇制度底該咒詛的遺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會審理幾個受賄者底案件，法庭證明丁被告有罪，但判決很輕。列寧對這樣的判決大爲震怒，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不把受賄者槍斃而給了這樣開玩笑似地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爲，這類受賄的同志必須交給輿論裁判，並開除出黨……』

過了幾天列寧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在信中他建議道：『立刻趕快提出一個法案，規定對於賄賂（收賄、贈賄，以及其他賄賂行爲等等）的懲罰，應該至少是十年監禁和十年苦役』。

列寧再三力求國家機關底精簡，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並且堅決同那些以冷淡的拖延態度來代替活潑的工作作風的官僚主義者作鬥爭。

爲了要大家不僅在牽涉國家利益的場合下，而且在牽涉個人利益的場合下，

都嚴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法令，列寧曾進行了有系統的頑強的鬥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說：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員會管理處所收到的一切對政府機關及人員的控訴報告給我，其中書面的控訴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口頭的控訴則限於四十八小時內報告。」

管理處對這些控訴應有特別的登記，同時對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應給以嚴密的監督，以執行我對這些控訴的決定」。

檢查執行——「檢查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及善於挑選人員，這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作上勝利的基本條件。

列寧認為確切地劃定各個工作人員的職責，確定「每個担任蘇維埃任何職務的人為執行一定的明白而不會糊地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和實際工作所應有的明確責任」，是正確組織蘇維埃國家機關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論對機關也好，對個別工作人員也好，列寧始終要求獨立和負責的工作。

他尖銳地斥責那種對工作無能和不願負責的現象，凡是個別工作人員及機關企圖把自己本來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勞動國防會議去解決，他都堅決地與之作鬥爭。

列寧向機關及個別工作人員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每件事做到底，做到有實際的結果。

他再三教訓我們要為完成所委託的工作而奮鬥，教訓我們不要停留在困難面前、不要援引阻礙順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說：必須善於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地重作，但是無論如何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了，碰了壁，那就重新再來過，這樣一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列寧這樣教導我們。

他尖銳地斥責和嘲笑懶惰、粗枝大葉、對工作隨隨便便、對世上一切都喜歡沾一手而又一事無成。

列寧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嚴肅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現了高度勞動修養底最好模範，表現了善於正確地配備工作、善於支配自己工作時間

的模範。

誰也不像他那樣懷着時間感，並善於珍惜它。列寧沒有一分鐘是白白過去；他從沒有表現過急躁，但他也從沒有拖延過。早晨，他總在一定的時刻來到，接見客人，主持會議，閱讀報告，並依據它們作指示，寫文章，指導黨前進的工作，而又總是在正四點時回家吃飯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是六點或五點半，總是充滿着精力和創造的積極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寧不僅善於珍惜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善於珍惜別人的時間。列寧領導的會議，不管到會者有多少人，總是準時開會。人民委員會及聯盟勞動國防會議遲到委員底姓名，按照列寧的吩咐，都登上了記錄簿，並且註明誰遲到了幾分鐘。如果無故一再遲到，列寧就斥責遲到者，警告說：再犯就登報。

列寧從不使那些在指定時間來見他的人們等候他。在稀有的場合下，當他同其他先來的工作人員談論工作而不得不延遲幾分鐘時，他就在指定的時間把秘書叫來，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們道歉，請稍微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列寧偶然經過彙報人的房間，看見整個房子塞滿了疲倦的人們，他們坐在烟霧迷漫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報，等着叫到會上去。

列寧馬上對秘書作了一系列具體的指示，要他排好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不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一個書面的指示，要他周密地排好一個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他寫道：

「現在彙報人一般總要等幾個鐘頭才被召集與會。這是醜惡和野蠻，必須做到使彙報人在一定的鐘點被召集到會上」。

列寧所主持的人民委員會及聯盟勞動國防會議的會議，都是在標本式的肅靜和全體出席者聚精會神之下進行的。這些會議對於蘇維埃機關底實際領導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學校。

列寧在主持人民委員會及聯盟勞動國防會議的這些會議時，總是盡力使討論簡短，使發言者說話明白而且扼要。會議上的長篇大論，列寧認為是無謂地浪費

時間。

列寧也批評和責難長篇的書面報告。

對於這樣的報告，列寧平常是從後邊、從實際的建議看起，如果發見這些建議是實事求是的，他才把整個報告看完。

不管他所擔負的國家事業多麼巨大，列寧都找得出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簡單細小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逝世第一週年紀念日發表於工人報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寧底這個卓絕的特點。他寫道：「從來也不拒絕細小的工作，因為大事是小事所構成的，——這就是列寧底重要遺訓之一」。

列寧以自己的指示、要求、個人例子培植了我們工作上的有修養的習慣和方
法，教育了我們實事求是地和獨立地解決問題，教育了我們對所執行的工作負
責，教育了我們把政府所通過的決議與法令確切和恰當地付諸實施，同時他在蘇
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中樹立了革命的紀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頑強地鍛鍊了一批新

的國家工作人員。

列寧在其寫於重病時期（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間）的最後兩篇文章裏，再度專門論述創立模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在「寧少勿濫」這篇文章裏指示道：

「我們無論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使得科學在我們這裏不再是死板的教條和空洞的漂亮話（用不着掩飾，它在我們這裏却常常是如此），使科學實際地化爲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變成生活底組成因素。」

自從列寧寫了這些卓越的話句之後，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了，我們偉大祖國底國家機關在這個期間是大大地增長了，它的工作範圍是更加複雜了，更加艱巨了，更加多種多樣了。

蘇維埃機關勝利地執行了它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中所擔負的各項任務。

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表現了特別高度的

組織性、紀律和效率。我們各個經濟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員部，以及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在戰爭日子裏進行了巨大而又困難的組織工作，並且保證了紅軍爲粉碎敵人所需要的一切。

現在，在愛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新的和平建設時期，我們國家面前出現了新的巨大的任務。這就對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說：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更爲重要的任務了，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這個勝利爲我們國家新的偉大的繁盛、爲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進一步提高，開闢了道路。在我們面前所展示的社會主義建設如此規模宏偉的遠景，以及蘇聯力量如此巨大增漲的可能性，過去從來還不曾有過」。

爲了執行這些任務，需要進一步改進蘇維埃機關底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條件下也工作得「像一個好的時鐘一樣，合拍而且準確」（斯大林）。

（齊生譯、曹葆華校）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朱可文

在現在正在進行着的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許多有關黨的工作方法的問題。被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問題。

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是社會的積極的改造者。它以幫助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工作的幹部，理解他們自己的經驗，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導他們，幫助他們糾正和預防錯誤，教育他們如何組織羣衆執行黨的指示。

如果黨的組織不去認真的集體討論問題，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黨的機關與基層組織，與廣大的黨員羣衆聯繫不夠，那它就不能真正去領導。只有黨的領導幹部在黨員面前經常感到自己是對他們負責的，只有遵行黨內民主及黨委

工作制，開展自我批評，真正的政治工作幹部才能產生和發展。

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有許多集體工作的形式，保證着廣大的黨員羣衆積極參加決定問題及執行這些決議。黨委制則首先就是說集體想辦法，作決議。無論怎樣有經驗的領導者，就拿省委或區委書記來說吧，僅憑他一個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足以從各方面都考慮周到，以製訂此一或彼一問題的正確決議。斯大林同志說：個人的決定往往是或幾乎往往是片面的決定。

只有在全體黨委委員實際參加討論和製訂計劃的條件下，正確決定問題才屬可能。黨機關的任何一個決議，都應當依據多數人的經驗，它應當是集體創造的結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就作決議，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糾正他人錯誤的可能，也正因為我們能接受這些糾正，我們的決議才能逐漸地正確。」

所以某些黨的領導者們，破壞黨委制決定問題的原則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區委書記認爲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個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體討論和集體決

定問題。舉這樣一個例子，在列甯里新黨代表會上（阿爾泰特別區）代表們說，區委書記希洛夫同志不考慮黨委委員們的意見。或者舉這樣一個事實，烏里揚諾夫省密列吉斯基區委書記傑民同志，處處剝奪區黨委委員的職權，不考慮普通黨員的意見。傑民同志經常個人決定問題，在成爲事實之後再告訴其他委員。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風」是官僚包辦。區委委員們害怕破壞他們和第一書記的關係，默認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開過的區委擴大會上，將這個幹部撤消了其第一書記的職務，是完全作得正確的。

這類不理睬集體意見的黨的工作者，因而就和黨的羣衆對立起來，他們忘記了政治領導人不是以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深思熟慮的提議去影響他人推動工作，而這是要靠處理問題的學識，善於聽取本機關團體成員的意見，說服他們，依靠他們來取得的。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不同，它要求領導者要盡許多的努力，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於團結幹部於自己的周圍的能力。黨的工作中官僚管理除危害我們的事業以外，絕無其它好處。它不是表現領導者的力量而

是表現他的軟弱。

領導上的黨委制，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緊張的工作中來。所以黨委開會時，如有多數委員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這種降低黨委作用的事實，在基洛夫市聯共（布）莫洛托夫區黨委會已經發生了。在這裏經常開多數委員不出席的區黨委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開的區黨委會議，七個委員只有三個出席。在這些會議上通過了吸收聯共（布）黨員，批准區黨委工作計劃，在勞動組合「阿爾其爾」（化學家）決定建立基層組織等這一些很重要的決議。另外一些專門問題討論會，也在多數黨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開過。在伊凡諾夫省卡佛里洛沃巴沙德區，還有比這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開的區委會，只有兩個委員出席就開了。實際是區委書記阿洛夫同志一個人決定了所有的問題。

用徵求黨委意見的辦法通過重要決議的作法，是破壞黨委制的一種形式。例如聯共（布）摩達維亞中央局用徵求意見的辦法通過了以下一些決議：「黨領導

共和國發展電力化的決議」，「關於中等學校教授倫理學及心理學的決議」，「關於固定共和國集體農場及拖拉機站中農業專門幹部的決議」等等。監定幹部往往也是徵求意見的方式。這類事實有許多其它黨的組織內也同樣存在着。

有些領導人認為，徵求意見通過決議似乎表現着領導的效能。實際上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效能，只不過是表現了對待問題的官僚事務主義態度。當然，某些無須討論的問題可以徵求意見決定，但是最重要的決議必須在集體領導的全體委員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徵求意見的辦法破壞着黨委領導制，縮小着領導集團中每個成員們的職權，削弱着他們集體工作的責任感。

集體領導就是進一步，隨時地接近黨員，傾聽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依靠黨的羣衆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領導者的眼界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們是從一方面，從上面觀察問題。相反的，羣衆是從下面觀察問題。他們的眼界同樣也是有局限性的。「為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必須結合雙方的經驗，只有這樣，領導才會正確。」（斯大林）

各個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參加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如果黨委會及積極份子會組織得好的話，它們就能使領導人運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經驗，在布爾什維克批評的基礎上揭發缺點，給該組織的活動指出正確的方向。但是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就是如當黨委擴大會及黨的活動份子會，降低到教訓領導幹部的學校的時候，這就必須糾正。這些會議不是每個地方都經常召開。如聯共（布）烏茲貝克斯坦中央全會，在一九四七年僅僅開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伯熱采市委在去年十個月中也祇開過一次擴大會。沃洛諾克斯基區委保加爾及布列安斯克省其它區黨委的擴大會也召開的不多。在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上的嚴肅地討論問題，有時為舖張形式所代替，會議講台用來大演其講，而批評及自我批評則平靜無聲息。

黨委工作制要求領導人善於聽取全體委員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建議，勇敢地接受對自己缺點的批評。他不能認為批評指責有損自己的威信，不得把個人自尊心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說過：「善於集體行動，個別同志的志願準備服從全體的志願，這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真正勇敢。所以，沒有這種勇敢，

不善於克服（假如你願意的話）自己的自尊心，並且服從集體的意志——沒有這些品質，就沒有集體，就沒有集體領導，就沒有共產主義。」

黨的領導人應當成爲布爾什維克對待黨員批評及正當指責的模範。然而其黨領導對批評兵刃相加，認爲它是「對個人的侮辱」，是「威信的損害」。在伏諾希洛夫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在幹部問題上，對省委書記也姆欽科同志，作了嚴格的確當的批評，他在自己的發言中打擊代表，並將幹部工作亂無頭緒的責任加在下級黨的工作人員身上。新西伯利亞市委委員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認對自己工作的批評，而斥責發言的代表，說他們似乎「無所事事，專以批評爲能事」。也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似乎同意批評，傾聽指責，表面上準備勇敢接受批評，但在實際上，他不採取任何辦法，實行那些會議上提出來的問題。這種對待集體意見的態度，其害處並不亞於直接了當的不願考慮意見。二者結果相同：降低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其糾正錯誤的責任心。

黨委工作制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要提到會議上解決，如果它不需要討論，也

可以個別處理。在這些情形下，此一或被一組織的領導人，不要害怕擔負決定問題的責任。但是必須注意黨委工作制，集體討論並決定問題，絕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個委員的個人負責制。

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須要個人負責制，正如討論基本問題須要黨委制一樣，爲了及時解決問題，爲了不推脫責任，我們同樣需要個人負責制，個人處理問題。」辦事必須嚴格分清歸誰負責，必須與對待這一問題的模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爲使黨委領導制不流於空談和紙上談兵，每個黨委必須負起委託於自己的責任，嚴肅進行執行決議的組織工作。工作中還有這樣的黨委委員，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坐下來開黨委會，參加討論問題，並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責任。黨委全體委員的責任乃是關懷已通過了的決議之命運，不屈不撓的爲其實現而鬥爭。

集體領導的方法是黨的工作之基礎，它是培養黨的領導幹部的最重要的辦法。黨的積極份子愈是廣泛地參與黨領導機關的經常活動，它就愈能迅速地受到

布爾什維克的教育，擺在黨組織面前的任務就能愈完美的解決。破壞黨委工作制原則應被視為是束縛黨員羣衆的創造性及自動性的官僚主義的表現。

布爾什維克黨是在牢不可破的黨內民主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黨章規定了廣泛發揚每個黨員及候補黨員積極性的條件，最嚴格遵守黨內民主，黨委工作制原則，使我們能夠正確的培養領導幹部，幫助我們不倦怠地提高黨的組織，對國家的及經濟工作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水平。

（張天恩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真理報）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

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蘇聯真理報社論

正確的政策是勝利的源泉，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勝利的本身。勝利不是自己會來到的，必須加以組織，加以爭取。

斯大林同志對於政策路線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典型的定義。他說：「在製定正確的路線之後，對問題已作出正確的決議之後，事情的成敗即決定於組織工作、人員的正確選擇以及對各個領導機關執行程度的檢查。否則，黨的正確路線與決議即會遭受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在製定正確的政策路線之後，組織工作即將決定一切，就是政策路線本身的命運——成功或失敗——亦不

例外。』

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所以能獲得連續的勝利，是因為黨經常以全部力量進行組織工作，以保證自己政策路線之實現。我們的黨正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完成共產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列寧與斯大林教導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最主要的是選擇幹部與檢查執行程度。黨的組織只要遵循這一指示，就可以使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方法在我國偉大建設的各方面都獲得進益。

目前所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指出：黨的組織爲了提高戰後時期的經濟與文化，正在進行着熱烈的與全面的工作，發揮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積極性與克服困難的堅定精神。黨的組織在全國人民中發起社會主義競賽，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在聯共黨中央對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頒佈後，各地組織即更加注意於思想教育工作。許多黨組織都積累了對羣衆宣傳鼓動的豐富的經驗。黨的幹部強固的掌握着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

但是，許多次的代表會議也指出了黨組織在領導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嚴重的缺點。仍然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注意於開會，準備決議與製成決議。而在決議一經製成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這些決議忘得一乾二淨。製成的決議在實踐中會怎樣，所能實現的程度如何，是否所有的機構都已行動起來，遇到何種困難；需要採取何種補充措施以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對於所有這些都不給以應有的注意。例如，乞卡洛夫州的黨代表會議指出：州黨委與某些區黨委減弱了對自己決議的執行程度的檢查。州黨委與區黨委對於決議的執行只倚靠着自己小團體的活動，未能發動黨的幹部與蘇維埃幹部以及廣大勞動羣衆積極參加工作。在萬不得已時方派遣全權代表的辦法，在這裏已成爲領導上的主要手段。日常的細密的羣衆工作，對幹部的指導等時常是被無數決議的傳達與電報的拍發取而代之。

這樣的領導方法會造成一種錯覺，即是：黨委會如能製成大量的決議，向各地發出許多電報，就似乎能表明它在工作中確實有足夠的緊張。但實際上，黨的機關正是因爲忙於這些工作而使自己不能廣泛並全面的推動事情的進程。這樣，

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的提高全部工作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原則要求：在製成決議之後即須計劃並製定方策以保證這一決議的執行。在一種情形下，需要派出一個或一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至現地去。在另種情形下，則必需給以物資技術器材的援助。總而言之，組織決議的執行，這就是說要發動黨與蘇維埃的無數幹部積極工作，由他們領導廣大人民克服困難，保證以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完成國家當前的任務。與幹部們一起工作，給他們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檢查的主要方面。黨委會的責任在於使工作人員們明白他們所執行的任務的實質，使他們了解用何種方法可以更好的執行決議，最好是選擇何種組織形式方能增加黨發動羣衆的力量，保證黨組織當前任務的解決。

檢查執行程度是黨組織手段中最有效的武器。但必須嚴格遵守下述數點：

第一、對執行程度的檢查必須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插曲式的。就是說，在製成決議之後，不遲疑，不等待，立即督促決議的執行。黨委會必須了解該組織的

日常生活，惟有如此，它才能隨時隨地過問並在必要時糾正工作。這樣，對執行程度的檢查方能隨時發現工作中某一段落的混亂並及時找出造成混亂的責任者。只有隨時並有系統的檢查執行程度，方能預防錯誤和缺點，也只有如此，黨委會方能適時的幫助自己的地方組織。檢查執行程度乃是黨組織以布爾塞維克責任心與紀律性教育幹部的有力武器。

第二、檢查執行程度不應該由次要的工作人員負責，而應該由領導人親自動手。列寧曾要求各組織，各機關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領導下的有經驗的，得力的工作人員「控制在自己手內，用以檢查實際工作之進行」，委託「某某人，到那裏去，視察、檢查，如果事情出漏洞就要你負責」。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領導人親自檢查工作並能使工作檢查發生效力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第三、檢查執行程度應該不只是根據形式的報告，而首先應在工作地點，根據工作的實際效果檢查之。

第四、檢查執行程度必須是客觀的，嚴格的。惟有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

自我批評方能及時揭露缺點並製定糾正缺點的方法。檢查執行程度時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舞弊徇私。那裏發展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風氣，那裏就會產生不負責任的情形，跟蹤而來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漠不關心與不忠實。對着缺點應該不是掩飾，要展開尖銳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不是寬容，要用非常嚴格的態度對待它——這是使檢查執行程度收效的一個重要條件。

檢查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檢查執行程度的結果可以反映出黨委會的全部領導作風，組織黨的積極份子、全體共產黨員、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工作的能力。如果要加強對工作的督促與檢查，就必須改進全部的領導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工作的檢查如能組織良好，就會像探照燈似的，隨時隨地照明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使官僚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暴露自己的原形。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工作中十分之九的缺陷與漏洞都是由於缺乏組織良好的工作檢查而來。無疑問的，如果有正確的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大都可以避

勇的。」

黨組織的責任是對於決議執行程度的檢查工作加以積極的改進。而決議的本身則應確實符合蘇維埃人民為執行其所擔負的偉大任務的要求。這就是我國經濟、文化生活與共產主義專業建設各方面的新的勝利的前提。

（常彥卿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真理報）